



玻璃屋

下

蔚 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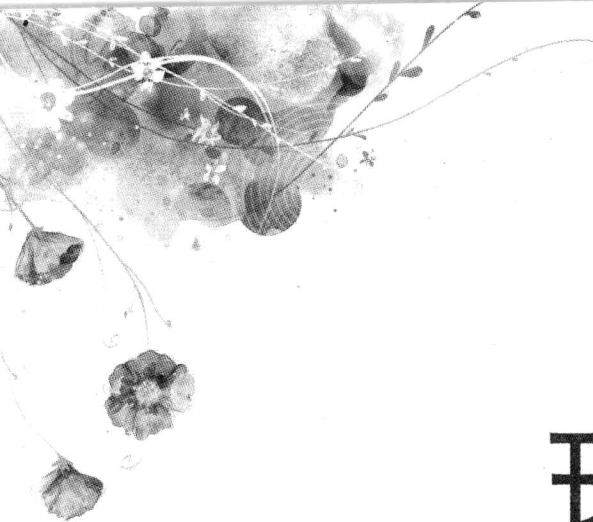
大众文库 世情小说卷 张贺琴 主编

揭密社会隐私

写真众生情感



大众文艺出版社



玻璃屋

蔚 蓝◎著

大众文库 世情小说卷 张贺琴 主编

写真众生情感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我衷心地向她道了谢。然后找到姐姐，又一起来到五十米开外的分院。挂上了号，我们在二楼精神科的走廊上坐下来等着叫号。

这里的两排塑料座椅上坐满了等着看病的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患有什么样的精神疾患，不过多数人看上去同常人无异，但有的人就显得不大对劲。尤其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至腰间的麻花辫的中年妇女，她在走廊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同时不停地用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愤怒地声讨着某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她的身旁，一个从面貌到精神都显得疲惫而无奈的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慷慨激昂的妻子。这个女人的思维显然跟她的装束一样仍旧停留在某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空里，从她滔滔不绝的论辩内容听来，我推断她或许是一个在“文革”时期相对于整个时代悲剧而言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正想得神，我旁边的姐姐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好端端一个人何苦跑到这里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无言以对。



那个负责叫号的中年护士满脸横肉，一口居高临下的北京话，态度骄横无礼得同她身上那套洁白柔软的护士服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挂号看病的人都不得不咬牙皱眉地忍受着她的呵斥。半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咄咄逼人地喊到我的名字。在她冷漠地指引下，我推开一扇标有“精神科”字样的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诊室，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夫在桌子后面正襟而坐，想必就是 F 教授了。他个子瘦而高，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学者风度。他抬手示意我坐下，然后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等待我陈述病况。

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还是 F 教授先开了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他的语气和态度有一种安抚人心的郑重和谦和，我开始觉得自己镇定下来。鼓起勇气，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做变性手术。他听了毫无异状，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往下说，同时拿起笔来刷刷地在面前的病历本上写起字来。

我从来没有当着—个陌生人叙述自己内心状况的经验，何况还是那么隐秘而不可示人的，我不知道怎样开头。F 教授就耐心地引导我，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平常得如同一个普通感冒的诊治场面。而且他严肃的态度也渐渐使我觉得，我并不只是作为一个心理疾病的患者讲述着难以启齿的个人隐私，而是配合着一个精神病专科的医师进行着某一种严肃而有益的医学探讨。我慢慢地放松下来。

最后，F 教授问我，你一定要做手术吗？我说我必须这样



做,因为我生活得很痛苦。他问我怎么痛苦?我又一下子顿住了,尽力思索了一番,但还是感到大脑空白一片。那些常常令我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的疯狂和痛苦都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在来京的列车上,我也如同临考的小学生一样,在心里反复地演练又演练的。沉痛的倾诉,失控的情绪。痛不欲生,五内如焚。那些平时不招自来一呼即出的情绪此刻却好似统统从干涸的舌间蒸发了。我勉强地说下去,但结结巴巴、辞不达意。我感到自己的叙述是那样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甚至显得有些拙劣。我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能够博取他人理解和支持的气氛,我简直恨自己。

后来,F教授合上了病历。在窗帘的阴影中,他的脸显得白皙而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无权干涉你的选择,但作为一名医生,我仍然要劝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施行变性手术之后,你的工作、生活、处境和婚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况且,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必须对你交代清楚。在我们医院,目前对于施行变性手术的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其实并不是很理想和成熟的……

我一听就急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X教授成功施行多次手术的消息为什么会见报呢?教授静静地凝视着我,后来回忆起来,我觉得那一刻他的目光中有一种超越凡俗的深邃。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他说你以为凡是用铅字印出来的东西都是实事求是和不容置疑的吗?



这真是一句睿智的话。后来，随着年事渐长，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发现，的确有很多看似权威和确凿的结论，实际上既可能是无知和狂热的产物，也可能是在各种原因下利益权衡的结果。而如果仅仅凭借着一个貌似公允客观的论断就盲目地丢弃自我的判断力，那将是一种现代的迷信，是一件非常可悲和危险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我年少识浅，又被不顾一切的狂热冲昏了头脑。对于 F 教授的话，从理智上讲，也许对我已经有所触动。可是从感情上来说，我却掩耳盗铃地根本不愿去加以分辨。

F 教授看我沉吟不语，他也停住了话头。他以手支颐沉思了片刻，好像是在权衡着下面将要说出的话的分量。他看上去顾虑重重，但终于还是下了决心。

年轻人，你听我一句话。社会很复杂，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很多事情都是利益驱动。虽然公平地讲，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克尽职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少部分医生也变得惟利是图起来，只顾成名得利，极度缺乏对社会的责任心。据我所知，自从你看的那篇报道刊登以后，全国很多患者慕名而来，可是手术后才发现效果和宣传的存在着一定差距，现在已经有一名患者正准备和 X 教授打官司。作为一名精神病专科的医师，我对你们这些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深表同情和理解，可我还是希望你要慎重考虑一下，毕竟人体上的部件不是随便取放的。

F 教授的一席话让我心绪沉落。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同时也是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从他端方严肃



的神态中，我找不出一丝挟私诬人的阴暗。而且即便是处在那么一种精神上极端偏激的状态中，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遗憾的是，如果这的确是一种心理病症的话，那么我已是一个病人膏肓的患者。没有人能够遏止我对“痊愈”的渴望，再高明的道理也无法说服我放弃自己的追求。我只有而且惟有孤注一掷，因为我已别无选择！

最后，F教授似乎也看出他那番话对我并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他有些疲倦地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然后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来。他让我先去做个心理测试看看再说，这也是施行手术之前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

6

我在F教授的指点下来到收费处，问清收费数目，正准备交钱。这时候姐姐追了上来，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大为紧张，一定要我带她去找F教授问个清楚。我没有办法，只好又和她一起来到刚刚离开的诊室里。

F教授正在为一个女病人诊治，我们的到来打搅了他，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了姐姐的询问。他有些无奈地指着我说，这个



孩子不听我的话，一定要做手术，我只好先让他做个心理测试看看。姐姐一听就急了，说我们家属不同意！我也急了，因为此类手术施行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取得直系亲属的同意。而如果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医院是不予考虑的。我赶快伸手去扯姐姐的衣服，可是她不理我，还在不停地说。一股火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我一扭身冲出房间下楼到收费处就要开票。

姐姐又追了上来，她拽住我不让我去。我使劲扭动着身体想甩脱她，可是她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尽管被我甩得踉踉跄跄，但还是死死拽着我的衣服不撒手。

旁边已经有不少人驻足看起了热闹，我又羞又气，就对姐姐喊，我不去了，你放开我行不行！眼泪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姐姐一松手，我推开围成一圈的人，就拼命向外面跑去。

心里太气太恨了，那一刻冲动得简直恨不得冲到马路上被车撞上才痛快。姐姐追上来拦住我，我又转身往里跑。从来没有那么气过恨过，也从来没有那么不顾死活地跑过。世界在我颠荡的视野里疯狂地跳动着，骤然失控的情绪使我危险得如同一列脱轨的列车。

晕眩、恶心，上气不接下气，心脏仿佛要蹦出体外，我终于瘫倒在医院的草坪上，哇哇干呕起来。紧接着，姐姐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我看她的脸色都不对劲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顾弯着腰拼命地喘着气。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不管是精神还是体力。我不停地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把自己搞得那么



累,不光自己,别人的生活也被我搅得一团糟。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啊,我也不愿意这样,我也渴望幸福安定的生活,可为什么就不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扮演一个我既不喜欢又不胜任的角色呢?到底是谁,剥夺了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疼我爱我的至亲的亲人们,你们为什么就不理解我?

我觉得自己突然丧失了对自己肢体的控制力。它已经受制于一种凶猛而疯狂的力量,它一阵阵地想打人、撞头、摔东西,毁灭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那么多年积压的所有痛苦、愤懑和巨大的绝望和希冀在这个强力刺激下,突然惊天动地地爆发了!我拼命地掉着眼泪,恨不得把我的心哭出来才痛快解恨!

姐姐坐在我身后的长椅上,她脸色苍白地望着远方的天空。我可怜的多病的姐姐,她承担了本不该她承担的责任。这担子太重,她担不起。她进退两难彷徨无主,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首都北京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声。阳光均匀地铺洒在草坪上,风一吹过来,那些金色的花草就在我朦胧的泪眼中好看地舞蹈起来。这一切,连同一种深刻的哀伤,和烈火般烧灼的渴望,深深地浸润到了我的心底。这是今生再也无法忘怀的风景。



7

下午，交钱挂过号之后，我独自走进了那间标有“心理测试”的房间。那里的大夫给了我几张表格和一支笔后，就坐回桌后不闻不问了。我坐下来，像一个坐在考场上的学生一样，仔细阅读那份列出了许多诸如“您的父母是否表示过希望您是个女孩子”，或者“您小时候是否喜欢和女孩一起游戏”等问题的问卷，并按照要求在题后所列的选择项打勾。有些问题我稍一思索就一挥而就，而有的问题，像“您对同性感兴趣吗？”，我就相当谨慎。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当成为了名正言顺地满足自己逆反的性倾向，而混迹于真正的“易性症”患者的同性恋者。从报纸上得知，这一类人是不予考虑的。

我注意到，在这里接受测试的，除了我还有一个不知道测试何种项目的女孩子。大夫不断地提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要她一一回答，似乎是在测定智商。我以为接下来我也要接受同等测试，可是答完问卷后，大夫就说我可以回去了，问卷将由微机进行分析汇总，结果出来后按测试者留下的地址寄给本人。

我和姐姐又折回到整形科，X教授仍然不在，仍然是一开始



的那个老年女大夫接待的我们。我现在才知道她姓钱，钱大夫先简略向我们介绍了手术的一些情况，然后拿出一张盖有公章的打印信笺交给我。上面列着四项手术前的必备手续：1 精神科医师的证明。2 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3 父母同意的签字信。4 本人申请。

在我看来，其他三项似乎不足为虑，就是三万元钱的手术费用虽然不低，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筹措的。惟有当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要求，我觉得这才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这样一种剧烈的社会身份的变更，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国，即便已经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是要获得国家执法机关的认可，凭常识和直觉推断，我想那一定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钱大夫却让我不必担心，据她说凡是在他们这里做过手术的患者，术前只要手持这份我刚拿到手的公函，没有不马到成功的。而且她还说他们所做的二十几例患者，术后公安机关均给予改换户口和身份证，更有幸运者已经顺利地结婚成家。

她轻描淡写的口吻给我的感觉是，变性手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非但不是一种距公众认可路途尚远的新生事物，反倒似乎已经一路绿灯而畅行无阻了。我听得半信半疑的，但不能否认，钱大夫颇富感染力的语句所昭示的光明前景，让我紧绷如弓的心弦顿时松弛下来。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大夫进来在我对面坐了下来。钱大夫似乎希望活跃一下谈话气氛，就转向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



小伙子，让他给我预测一下手术后的效果。他听完钱大夫的话，就开始仔细地打量着我。我不由垂下眼帘，男人的目光总是让我羞赧不安，既渴望、又自卑。他观察一番后评价说，“外形倒是蛮秀气的”，然后他问了我几个诸如姓名和单位的简单问题，我猜想他是要测试一下我的声音。我轻柔的音质似乎也令他十分满意，他断言说手术效果一定不错，并欣然表示将由他主刀。那跃跃欲试的神态，使我联想到一个雕塑家在面对一个激发出了自己创作灵感的毛胚时，那种难以抑制的亢奋之情。我有点得意。

这时候正巧 X 教授来了电话，钱大夫就替我们转达了希望面谈的请求。听她说 X 教授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易性症”患者心理研究的论文，因此他很爽快地答应我们的请求。

8

在钱大夫的指点下，我和姐姐在住院部一楼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找到了 X 教授。X 教授五十多岁，秃顶，但保养得当，看上去气色颇佳。一见面他就声明他正在撰写论文，时间有限，只能够给我们半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我的来意教授自然清楚，接下来，他单刀直入，首先对我进行了一番医生兼长者的劝戒。他态度随和，说的意思也和 F 教授几乎如出一辙。但是，不同的是，也不知道是在他侃侃而谈但却不时恍惚的眼神里，还是在缺乏情感色彩的说教中，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表现得并不明显的漫不经心。况且，X 教授似乎也并不急于看到他的这番话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说了不长时间，他就适可而止地停住了话头。

然后，像是例行公事一样，X 教授要我谈谈要求施行变性手术的原因。又来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面前这个人主宰着我的前途命运。他既可以给我一个修正自身错误的机会，让我的人生从此柳暗花明；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我拒之门外，彻底消灭我最后一线残存的希望。关键是一定要表现出病人膏肓痛不欲生的状态，我必须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拼命让自己镇静下来，试图尽快进入角色。但是，可悲的是，上午失败的经验又一次重演了。我的大脑似乎被置于真空状态般一片空白，感情也变成了一块毫无水分的干燥海绵。不管我怎么焦急，如何努力，都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我迫切需要的那种令人理解、同情和具有说服力的气氛。我觉得尴尬极了。由此断定，当演员极其需要天赋，而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我缺乏调动和驾驭情绪的能力，我来不了半点假的。要是有了那本事，我不是就能够把那个真实的自我隐藏得严严实实，从而可以避免很多的痛苦和伤害，那我还来这里干吗？



但是,我知道,在潜伏于未来的无数个时空中,我的疯狂和痛苦又不知道会多少次卷土重来,折磨我,蹂躏我,一寸寸地残杀着我。可是它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在惟一需要它们的时候,却躲得无影无踪了呢?我真是绝望到了极点。

不过,X教授似乎对我的陈述并不大在意。话锋一转,他开始谈起了自己。他说他的亲人朋友是如何不理解他所从事的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而他又是如何顶住巨大的压力运用精湛医术为患者再造新生的。X教授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亢奋的神态使我不得不怀疑他一定是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拯民于水火的英雄。

接下来,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X教授居然主动谈起了那起听F教授说过的,但到了这里就成了别有用心的“诬告”事件。他语带激愤地发表着议论,让人觉得,像他这样一位心系患者的医家圣手,竟然会遭到如此不攻自破的拙劣谎言的攻击,真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可是,无从解释理由的是,我和姐姐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在那些滔滔的自辩之辞中,有许多空洞无力的东西,那是就连对于医术一窍不通的我们,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的牵强。

X教授终于停止了她的表白。而总算插上话的我们,还想再咨询一些关于手术的具体问题。可是X教授抬腕看表,已经下了一道无声的逐客令,我们只好满腹狐疑地告辞出门。



这其实是一种命运,其结果早已注定。但后来我仍然常常想,如果我们前去求医的是一家足以令人充分信服的医院,经过缜密考察和判别,而为我做出一个“确系易性症患者,应予手术”的诊断结论,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我的父母一定不会不遗余力地予以阻挠的,他们肯定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拥有一个美好和幸福的人生。那么,我的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然,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命运就是命运,它具有神秘的不可逆转性。现在再想,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一位万能的主宰的话,那么我深信这一定是一种特别的机缘。也许该经历的我还没有经历,该遇到的人不能就此错过。在这之后我所体验的一切将会成为撒播在心灵中的特殊种籽,而它们会在神秘的授意下,绽放出某种奇异的花朵。谁知道呢?这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预感,而预感在成为现实之前永远只是预感。可是现在,我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的心中仍有苦痛,可是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去超越它。而我所有的苦难,同时又将或者已经成为了我



的财富和教益。这就是这本书所要告诉大家的。

可是，在一九九五年被巨大渴望裹挟着的我，当然还不曾具备洞察这一切的能力。尽管疑虑重重，但就像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彩票能够获头奖心存侥幸一样，同样没有人会相信倒霉的事情会落到自己头上。我甚至努力强迫自己确信这一点：这是一家在京城乃至全国颇负盛名的医院，毫无疑问，我一定会得到认真负责的诊断与治疗的。这种现在看来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安抚了我的焦躁和疑虑，我由衷地高兴起来。

怀着巨大的希冀奔波忙乱了一天，眼泪、失望和焦虑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我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可是不管是走在首都黄昏人潮涌动的街头，还是被挤得东倒西歪地站在公共汽车上，从人体的缝隙间注视着快餐店、时装屋或者电影院这些城市的橱窗在车窗上一闪而过的时候，我的心就充满了一种蓬勃的欢欣。我渴盼已久的新生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不是吗？单是想一想还仅仅处于“可能”的未来，一阵阵快乐的激流就抽搐般强烈地贯穿了整个身心。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终于成为了我想做的人，我一定会怀着如同点燃了引线的炸药包一样威力惊人的热情，去一往无前地投入我可爱的生活的。



我想家了，想爸爸妈妈和我堆满了书的卧室，想我的办公桌和准时到站的通勤车，想所有熟悉可亲的面孔、场所与心情。火车快快开吧，当北京从我的目光中徐徐退去、消失，我衷心祈愿，在不久的将来，我将在它特别的气氛中，完成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变。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我只渴望身心真实自由的生活。让我挥别往日惨痛的梦魇吧，让它成为一种因它的存在而使未来的快乐和幸福越显其真谛的参照物。给我一个真实的灵魂吧，让我去尽情地感受和创造爱与美。为了阳光、蓝天，为了雨丝的芬芳，和生命中每一个值得记取的瞬间。为了人类一切美好的艺术在我的心灵中引发的感动和震颤。为了世间所有美丽可爱的女子和阳刚豪情的好男儿。为了友谊为了爱。为了让我更好、更自由地去爱这个世界。上苍啊，请让我早日成为一个女子吧！

我深信我的人生将从此与众不同。